

## 第 2 章

# 发达国家的现状

我们所关心的是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实际遇到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在财产所有权方面确实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公平。如表 2-1 的数据<sup>①</sup>所示，20 世纪 50 年代末，虽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采取一些显著的均等化措施，但英国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分布仍然极不公平。例如，不少于 75% 的私人财产由只占人口 5% 的最富有阶层占有。此外，富人的财产收益率也比穷人高，想必部分是因为富人通过金融咨询师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部分是因为财产越多，风险就越容易分散，因此，平均收益率就越高。结果，财产性收入的集中程度比财产所有权本身的集中程度还要高。1959 年，英国不少于 92% 的财产性收入被占人口 5% 的富人占有。<sup>②</sup>

这种集中对于总收入人际分布的影响要取决于另外两个比例。

- 
- ① 笔者要感谢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的 J. R. S. 雷维尔 (Revell) 先生提供了这些数据。
- ② 从严格意义上说，财产所有权数据与财产性收入数据是不可比的。前一类数据的统计人口只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 25 个郡或管辖区的个人；而后一类数据的统计人口则包括英国全部所得税纳税单位。

Efficiency, E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

首先，第一个比例是财产性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小，那么，财产分布严重不公平本身不会导致任何总收入分布的不公平。当效率要求只把一小部分收入用于支付工资，而把大部分收入作为利润、利息和租金来分配时，财产所有权不公平就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其次，是劳动收入分配比例。如果富有的财产所有者不能赚取多于人均工资的劳动收入，那么，劳动收入就能降低由财产性收入造成的不公平；而如果富人的劳动收入也像他们的非劳动收入那样集中，那么就不会缩小劳动收入不公平。

表 2-1 英国个人财富分布

人口百分比	个人总财富百分比			(税前)个人财产性 收入百分比
	1911 ~ 1913年	1936 ~ 1938年	1960年	1959年
1	69	56	42	60
5	87	79	75	92
10	92	88	83	99

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可用以下一组公式来表示：

$$i_1 = p_1(1 - q) + l_1q$$

$$i_5 = p_5(1 - q) + l_5q$$

$$i_{10} = p_{10}(1 - q) + l_{10}q$$

式中， $q$  表示个人总收入中的劳动收入比例，因此， $1 - q$  表示财产性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例。如果  $p_1$  表示总收入最多的 1% 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占总财产性收入的比例， $l_1$  表示总收入最多的 1% 人口

的劳动收入占总劳动收入的比例，那么， $p_1(1 - q)$  就表示归这一人群以非劳动收入形式占有的个人总收入份额，而  $l_1q$  则表示归这一人群以劳动收入形式占有的个人总收入份额。因此， $p_1(1 - q) + l_1q$  或者  $i_1$  就等于归个人总收入最高的 1% 人口占有的个人总收入份额。类似地， $i_5$  和  $i_{10}$ 、 $p_5$  和  $p_{10}$  以及  $l_5$  和  $l_{10}$  分别表示 5% 最富有人口和 10% 最有富人口的以上各种收入份额。

通过英国 1959 年的收入分布情况，我们能够非常粗略地估计各  $p$  和  $l$  值，如表 2-2 所示。<sup>⊖</sup> 由于本书附录 A 中给出的原因， $q$  的相关值较难估计。不过，表 2-2 的最后三列给出了  $q$  分别等于 95%、85% 和 75% 时的  $i$  值。这些数据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q$  在决定个人总收入分布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当  $q$  等于 85% 时，占人口 5% 的最富有人群占有英国 24% 的个人总收入；其中，66% 是个人财产性收入，而 17% 是个人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分配远比财产性收入公平。如果  $q$  因自动化而由 85% 下降到 75%，那么，占人口 5% 的最富有人群（在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收入分布不变的情况下，即在  $p$  和  $l$  不变的情况下）占有 29% 而非 24% 个人总收入。可见，分配不公平的财产性收入相对于分配较少不公平的劳动收入占比更大。

⊖ 关于这些数据的来源，请参阅本书附录 A。需要指出的是，表 2-1 最后一列的数据不同于表 2-2 中  $p$  的数据，因为前者表示归属财产性收入最多的人群的财产性收入比例，而后者则表示归属各种来源收入最多的人群的财产性收入比例。因此，表 2-2 中，最富有人群包括劳动收入很高但财产性收入并不那么多的公民。财产性收入在表 2-1 中必然比在表 2-2 中更加集中。表 2-2 中的数据表示税收均等化前的收入分布状况。

表 2-2 英国 1959 年个人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收入分布

人口百分比	个人财产性收入百分比 ( $p$ )	个人劳动收入百分比 ( $l$ )	个人总收入百分比 ( $i$ )		
			$q = 95\%$	$q = 85\%$	$q = 75\%$
1	47	6	8	12	16
5	66	17	19	24	29
10	73	27	29	34	38

以上计算虽然不一定会误导，但很不完整。收入能力取决于教育和培训，而教育和培训则涉及对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人进行的稀缺资源投资。这种投资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和财产表现形式，而受教育和培训者的很大一部分劳动收入其实是投资于他们教育和培训的资本回报。这种形式的资本没有在表 2-1 和表 2-2 中得到体现。在以上这两张表中，个人财产只包括个人的有形可售资产，但不包括个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无形不可售资产的价值；而劳动收入包括因投资于教育和培训而增加的劳动收入。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沉没在全体居民教育上的资本的总价值有可能很高，如表 2-3<sup>①</sup>中的美国数据所示。

表 2-3 第 2 和第 3 行表示完全直接用于美国现有公民教育的资源价值（教师薪酬、学校运营成本等），其中还包括也应该包括受教育者因在学院或大学接受后期教育（而不是急着挣钱谋生）而放弃的工资收入。这是一种真正的资本投资，为了未来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收入。当所放弃的工资收入包括在教育的资本成本里时，后期教育的总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由表 2-3 可见，1957 年美国沉没在

① 这些数据取自于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的《教育的经济价值》，第 51 页。

全体居民教育上的资本相当于有形实物资本加上无形教育资本总量的 40%。<sup>①</sup>

表 2-3 1929 年和 1957 年美国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存量

	1929 年	1957 年
	(单位: 亿美元, 1956 年不变价格)	
1. 可再生有形财富	727	1270
2. 全体居民教育资本	317	848
3. 劳动力教育资本	173	535

当然, 对教育支出不能简单地像对任何其他形式的生产性资本投资那样来处理。教育支出会带来利益, 更何况还能提高受教育者未来的商业性收入能力; 能让受教育者享受更加完美的生活, 更不用说还能增加货币收入, 带来很多方面的社会利益, 如与受过教育的公民做邻居总好于与未受过教育的公民做邻居。同时, 教育作为一种直接的商业投资对于受教育者无疑也具有价值, 它能提高受教育者的生产率 and 经济价值。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 即使我们不去考虑教育能带来的一般文化和社会利益, 而把教育回报作为一个纯商业命题, 其价值也是很高的, 特别是在以前没受过教育的群体中间普及基础教育。<sup>②</sup>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世界各发达国家公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sup>③</sup>这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一股导致财产所有权和劳动收

① 即使我们只关注沉没在劳动力教育上的资本, 这个百分比也仍高达 30%。

② 西奥多·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第 62 页)提到了美国 1959 年基础教育 35% 的年回报率、中等教育 10% 的年回报率和高等教育 11% 的年回报率。

③ 据西奥多·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第 50 页)估计, 美国人均接受在校教育的时间由 1900 年的 4.14 年增加到了 1957 年的 10.45 年。由于在校教育后几年的费用要比头几年的基础教育贵很多, 1900 年和 1957 年期间, 沉没在教育上的人均资本成本甚至从 2 236 美元增加到了 7 555 美元(按 1956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人均等化的力量，还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1）追加的教育投资由已经富有的人还是仍是贫穷的人享受？（2）由谁承担他们的教育投资？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第一阶段教育的大扩展是一个最重要的均等化因素，并且是通过税收来筹集资金，而且在不产生直接费用的情况下向穷人开放，而税负想必富人多少要比穷人多承担一点。如果表 2-1 和表 2-2 中的个人财产和个人财产性收入的数据可修改成包括无形的人均教育投资资本存量以及作为教育投资回报的那部分劳动收入，那么，无疑就能显示不同于财产所有权和财产性收入的极端不平等的较大变化。

可惜，事实上我们无法安排我们的数据，以便把教育资本包括在个人财产中，而教育资本又有那么多的特点。因此，我们或许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把教育资本排除在个人财产之外。下面，我们只把个人财产作为有形资产来考察，并且把教育投资作为会影响收入能力的特殊类别的资产来处理。

上文已经指出，比率  $q$ ，即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决定财产所有权分布对财产性收入分配重要性的一项基本因素。在一个人口真正过剩的不发达经济体里，根据效率原则， $q$  应该几乎为 0。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就完全由财产性收入分配所决定。在今天的英国， $q$  大约是 85%，因此，收入分配较少取决于财产分布，而更多地取决于收入能力分布。

但未来呢？假定自动化将大幅度降低  $q$ 。英国有可能趋向于成为富庶版的毛里求斯，只有为数有限的极其富有的财产所有者，而且极其有利可图的自动化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很可能只占劳动人口的很小比例，因此，工资率可能会下降；而亿万富翁有高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生产则必然会获得大幅度的发展。我们还得回到一个充满被贫困化的无产阶级以及管家、跟班、厨娘和其他随从的超级世界里，让我们称它为“美好的新资本家天堂”。

这对于我来说可是一种可怕的展望。对于这个天堂，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书的以下章节将讨论四条可能的行动路线，我们可以把它们概述为取代“美好的新资本家天堂”的工会国家、福利国家、财产所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国家。

我将简单、粗略地阐述前两条行动路线，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熟悉与它们相关的问题。我的目的是要推荐最新的两种财产所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以引发更加密切的关注和研究。